

文章编号:2095-0365(2010)02-0013-05

规则与资源的重构: 村庄记忆变迁中精英行动策略的社会学解读

马小华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乡村精英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村治制度的切入点,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对乡村精英的探讨也越来越成为政治学或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讨论的重点和热点话题。以村庄记忆为参照物,探讨乡村精英在村庄记忆这一现代化产物的变迁中行动的策略问题,以精英的行动策略为对象分析和反思中国社会转型的后果是如何在农村社会中得到反映和体现的。

关键词:村庄记忆;精英;策略

中图分类号:D638;F127

文献标识码:A

一、以往研究的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精英一词最早是用来形容商品的精美,后来被演化用于居有优势地位的社会团体。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这一术语乃广泛运用于社会学与政治学之中,而对此的巨大贡献我们不能不归于帕累托精英理论的广泛传播。根据帕累托的提法,精英指的是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具有突出才能的人,而社区精英可定义为“社区中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能力的社区成员,他们往往是在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的个体或群体。”^[1]在韦伯那里,农村社区精英指的是“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能力的社区成员,他们往往是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的个体或群体。”^[2]在本文中,借鉴李军对乡村精英的界定即“所谓精英,是比社区中一般成员拥有更多的优势资源(经济、权力或关系)和个人能力(包括知识和为人处世的能力),并因此而为社区做出了贡献,进而具有了某种权威能够对其他成员乃至社区结构产生影响的社区成

员。”^[3]

对中国乡村精英的研究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费孝通提出了著名的“双轨政治”、另外孔飞力的“士绅操纵”和杜赞奇“经纪体制”都是早期比较典型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斯考特·罗泽尔所借用的由斯蒂格利茨提出的“主人—代理人”理论、王思斌提出了“边缘人”的概念,宿胜军提出了“保护人、代理人、承包人”理论。这些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一个农村社区精英的探讨来透视国家社会结构的变迁。郭正林研究了民主化过程中的农村精英,认为权力资源的结构决定了精英的不同类型,农村精英分为三种:经济精英、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影响人们的生活。陆学艺等认为所谓“社区精英”是指他们在社区生活的某一个或几个领域拥有优势资源,并且利用这种资源在相应的一个或几个领域中获得个人成功,这种成功使他们的行为或对维持既存社会结构有贡献,或者会推动社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对精英的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比较资源优势;第二,一定程度的个人成就;第

收稿日期:2010-01-07

作者简介:马小华,(1982-),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回族乡村社会组织、家庭研究。

三、这种成就对社区社会结构的维持或变化具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贺雪峰认为:理解村庄性质的基础是理解村庄历史的性质和理解村庄精英的性质。以社区记忆和村庄精英二维因素为主线,可建构起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依社区记忆的强弱和村庄精英的类型,可以把村庄分为四种类型。

描述改革前后中国农村精英变动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两派:一派是精英循环理论(Victor Nee),该理论最初由社会学家巴烈图提出,将精英的更替视为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新精英的产生和旧精英的退出是这一过程相伴相随的两个方面。Victor Nee认为:市场改革给生产者而不是对于再分配者带来了利益,也就是改革会减少因再分配体制而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不断的有新生的力量进入精英集团中,精英于是出现了循环。对此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撒列尼(Ivan·Szelenye),他从东欧匈牙利的研究中发现20世纪60年代的农场主不再是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而是40年代拥有土地而被共产主义集体政策剥夺者的后代,因此,精英在这里也出现循环。与精英循环理论相反,精英再生产理论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受益者并不是直接的生产者,而是旧体制下的政治精英。这些政治精英在市场改革中利用手中拥有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在实现自身角色转换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利益,继续保持着自身的精英地位,也就是说,精英的变化仅仅是精英集团内部的角色转换而已,精英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由于旧体制的精英在教育水平程度都比较高,因此容易获得较高的地位,另外这些旧体制的精英熟悉再分配体制的规律和漏洞,并且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使得这些干部在竞争中比较容易获胜。孙立平也倾向于把精英的更替看成是一个精英集团内部角色转换的过程。旧精英集团就像是一个原始胚胎,在社会转型的催化下,孕育、分化出不同类型的精英分子。

通过以上简述,发现以往对乡村精英的研究集中在讨论精英的秩序变化以及精英的社会功能方面,很少通过村庄自身因素的变迁来分析精英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社会转型后果。我们的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影响了怎样的村庄承载物从而影响着其中的精英们,以及村庄精英是如何应对转型效应的?本文试图探索性的解答这一疑问。

二、村庄记忆的变迁

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变迁,而中国农村社会无疑在这场巨变中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人们对农村社会的变化也一直集中在这些方面,而本文从一个村庄潜在的承载物——村庄社区记忆来探讨农村社会的变迁,“社区记忆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社区记忆的对立面即是社区不记忆,也即社区本身有无历史的问题。构成对村庄性质影响的是村庄的活的历史而非死历史,是村庄过去的生活为村庄今天的生活留下的影响力。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历史构成了村庄特性本身,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只不过是过去发生过的类似事情的重现与循环,社区生活中缺少新生的东西,也很少为新生事物留有生存空间。”^[4]村庄记忆作为村庄的历史承载物,在随着村庄社会的变迁而不断的积累扩展,一个具有较强村庄记忆力的村庄其村庄记忆紧紧的附着于村庄之上而成为村庄发展、变迁的历史见证。村庄记忆往往与村庄的关联度联系在一起,即村庄记忆强的村庄其村庄关联度也强,也就是说,在一个强村庄记忆的村庄中人们之间的联系性也很强,人们之间对传统的强认同感导致了人们之间人际关系的紧密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村庄记忆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在以往对村庄记忆的研究中,学者们是以现代化的发展减弱了村庄记忆为假设而讨论村庄关联度以及村庄整合等问题的,同时以往研究也很少将村庄记忆与村庄精英的行为变迁相连接起来。而笔者认为,村庄记忆在现代化大潮下,一方面有不断减弱的趋势,如在当前的农村基层干部的选举中,不在看重其出身等因素而是以其自身的能力作为参考,一些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导致了人们对往事的淡漠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村庄记忆有复原的倾向,如在中国南方一些农村出现的宗族势力的恢复加强以及家谱、宗祠的修复等现象正是村庄记忆复原的最好例证。所以在村庄记忆时应从其强化和弱化的两方面入手。

三、乡村场域中的规则与资源

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各个层面,场域概念始终在其中贯穿交叉着,成为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

主角,其在布迪厄的理论思想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有着十分广泛的内涵和外延,但从布迪厄对其简单的介绍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5]不难发现,场域其实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的社会场合或着是一定社会领域而已。有人从客观的空间角度来解释场域,认为一个小的场域就是一个小的独立空间,而大的场域是由相互独立和联系的“子场域”构成的。有人从社会空间中关系网络来理解场域,如刘少杰认为:虽然场域中有社会行动者,团体机构、制度和规则等因素的存在,但是场域的本质是这些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其实上述两种理解并无本质差别,空间与其中的关系是一个不能分割的统一体,而乡村社会作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诸要素的统一体便成为了一个各种农村社会关系交织的实体场域,当然这为分析乡村精英的行动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工具。

在场域的定义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词那就是位置,位置在场域理论中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方面,不同的社会构成要素在场域中占有不同的位置,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在整个场域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效应,另一方面场域中的活动成员因占有不同的位置而占有不同的资源,同时在拥有不同的资源后获取不同的位置。所以说位置的概念既具有对场域构成要素又具有对其中行动成员的双重意义。资源既是场域中获取位置从而得到更多资源的重要因素,又是场域中行动成员之间相互不断产生矛盾的根源。从而在场域中对各组成要素以及其中的行动成员之间形成了相互认同的约束规则。根据吉登斯对规则的描述人们知道规则的功能表现在对意义的构成和对对象社会行为的约束,而这种约束既表现在对显在的日常活动的约束与规范又表现在对潜在的场域承载物和行动成员行为价值方面的约束和影响,所以场域中的规则具有对显在和潜在的场域存在物的约束力,而这种约束力具体表现在对场域中话语、惯习、资本、权力等的控制之上。通过场域的不同位置场域的要素占据了不同的位置,形成了不同的资源价值,场域中的行动成员因占有不同的位置而拥有不同的资源,资源的争夺产生矛盾,导致对不同要素以及行动成员在资本、权力、惯

习、话语等方面进行显在和潜在约束的规则的产生,这就是场域、资源、规则的基本关系模式。

四、乡村精英的行动策略

“策略”也是布迪厄的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之一。“所谓策略,它指的是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的积极展开,而不是对业已经过计算的目标的有意图的、预先计划的追求;这些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乃是对规律性的遵从,从连贯一致且能在社会中被理解的模式的形塑哪怕它们并未遵循有意识的规则,也未致力于完成由某位策略家安排的事先考虑的目标。”^[6]在布迪厄的策略理论中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利益,利益既是策略的构成要素也是场域的主要要素,在场域中利益引导行动成员采取行动,利益既是客观存在于场域中的现实存在物,又是行动者在场域的行动过程中主观建构和比较而得出的主观心理意识形态。从场域到位置,从位置到资源,从利益到不同位置的期待和转换,利益在资源的转换中起到了催化和提供动力的作用。场域是乡村精英行动的空间环境,乡村社会给精英们提供了广阔的行动场域和场域资源,乡村场域是村庄精英的表演舞台,场域带给精英们活动空间的同时也附加了其中的承载物村庄记忆。现代化建设改变着村庄的记忆度,在前面提到村庄记忆有变强和变弱的两种趋向,讨论村庄精英行动策略也是在两种趋向之下展开的,即:在村庄传统话语渐弱、村庄承载物影响渐微、村庄记忆的影响力势危下村庄精英的行动策略,以及在村庄传统回归、传统因素复原、村庄记忆度趋强的情况下,村庄精英的行动轨迹。探讨在两种趋向下村庄精英是如何乡村场域中,受到场域利益以及内在心理利益的驱动,通过自身策略的改变来达到场域位置的获取以及场域资源的占有。

以往对乡村精英的分类有:一是根据乡村精英所属领域的不同将精英分为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三个类别,二是根据乡村精英体制归属的不同将精英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两种类型。体制内精英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村干部,体制外精英即乡村当中具有权势的乡绅、宗族头领、家族族长、乡村宗教精英等。当然,在当前由于乡村社会在中国社会转型之下发生的巨大变迁导致了上述两种对精英类别的划分产生了一定的模糊性,即一个归属于经济领域内的精英有可

能同时可以划分为政治精英。一个乡村精英既可能是体制内的同时又有可能归属于体制外,也即当前乡村精英具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重性,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正是笔者本文所要探讨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属点。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它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及其相互争夺的行为。场域中的要素的改变会激发潜在的行为的发生,乡村场域记忆的变迁导致的是场域中行动成员行动策略行为的改变,策略行为是场域行动者在分析场域结构性特征后而采取某种手段和方法来应对场域结构的社会行动。乡村精英的策略行为即乡村精英在乡村场域中面对乡村社会的变迁而采取的不断应对乡村社会变迁的手段和方法的社会行为。

通过上述阐释,现在回到讨论的核心即村庄记忆的变迁如何影响了乡村精英的行动策略。首先当村庄记忆趋弱时,一个村庄场域中的资源会更多地趋向于体制内或者趋向于经济与政治领域,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在一些村庄城镇化、现代化的建设中一些宗族头目、私人企业家向政治领域靠拢即出现“乡村精英入党热”、“乡村精英参政热”的原因。其次在村庄记忆趋强时,一个场域中的资源会更多地向体制外或社会领域内,这也正是当前在乡村基层组织权威不断缺失、宗族、家族、宗教等势力趋强的主要原因。乡村场域为乡村精英提供了行动的舞台,乡村精英们为其中的资源的争夺而不断变换行动策略,当然这种行动策略的变换只有通过自身内在资源以及场域外在环境的变化来实现,通过以上描述现象我们发现乡村精英更多的是通过对外在的场域要素来应对村庄记忆的变迁,而作为精英行动场域中的重

要要素的规则与资源无疑成为了精英首先改变的对象。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经济领域到政治、社会领域,乡村精英随着行动场域的变化而拥有不同的资源和适应不同场域规则,在乡村大的场域内乡村精英们不断的寻找、变换和重组着新的小场域,因为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资源,占有不同的场域位置,就拥有了不同的场域资源,场域资源重组着场域中的要素为行动着获取新的场域位置提供着原动力,但所有这一切的变化都是以乡村精英对场域中规则与资源的重构为前提的,即村庄记忆引起了精英对场域资源与规则的反思,而新的村庄记忆结构导致精英们对场域规则与资源的重构,以换取不同的场域位置,而新的场域位置又给乡村精英提供了新的场域资源与规则,这就是乡村场域中精英行动的策略轨迹。

五、结语

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异质性与复杂性,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差异性,导致中国乡村社会场域要素变迁的多样化,而作为乡村重要的承载物的村庄记忆在分析乡村社会的变迁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村庄记忆变迁趋向的划分来分析乡村场域中行动成员行动策略的变化,从复杂多变的乡村社会变迁中抽离出重要的场域变迁分析要素具有十分重要研究价值。有助于研究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下发生不同变迁现象的动力差异的根源,特别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社会变迁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多样性的探索性研究具有从宏观的结构变迁分析到对微观的行为策略探讨的转变意义,为新时期探索乡村社会新的变化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思路 and 探索方向。

参考文献:

-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86.
- [2]李婵.农村社区精英研究综述[J].中共市委济南党校学报 2004,(3):60-63.
- [3]李军.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精英与社会资本建构[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6(4):5-10.
- [4]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

框架[J].社会科学辑刊,2000(4):34-41.

- [5]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第二部分,反思社会学的论题)[M].北京:中共编译出版社,1998:134.
- [6]罗克·华康德.实践与反思(第一部分,迈向社会实践理论:布迪厄社会学的结构和逻辑)[M].北京:中共编译出版社,1998:27.

(下转第24页)

- 界出版社, 2007.
- [8] (英)阿尔弗里德·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M]. 朱志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9] 黎诣远, 李明志. 微观经济分析[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 [10] 黄蕙. 环境要素禀赋和可持续性贸易[J].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54(6): 668-674.
- [11] 汤天滋. 环境是构成生产力的第六大要素—保护和改善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解析[J]. 生产力研究, 2003(1): 61-62.
- [12] Li lijun, Li yanli. The Innovating Discussion on Bourse Mode Emissions Trading [C]//Proceedings of 200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 Management.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 [13] 李利军, 李艳丽. 环境资源管理市场化的产权问题及解决思路[C]//董克用. 构建服务性政府.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92-400.
- [14] 李利军. 环境生产要素理论研究[D]. 天津: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2009: 145-148.

A Preliminary Study of Green GDP and its Coordination with Accounting Based on Environment Capacity Production Factor Theory

LI Yan-li¹, LI Li-jun²

(1. Dean's Office of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Green GDP accounting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developm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green GDP study and practice, such as the related theoretical support deficiency, interiorization being obvious, and technique barriers, etc. Environmental capacity production factor theory hold out that the environmental capacity is also a production factor,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capacity production factor procurement should be listed in deduction item of economic value added, so the pollution damage loss can be mensured in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This point of view is in line with the economics principle, thus environment external cost interiorization can be realize by market forces, and green GDP accounting technical barriers problem can be solved.

Key words: environment capacity; production factors; green GDP; economic value added; accounting

(上接第16页)

Reconstruction of the Rules and Resources: Memory Change in the Village Elite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Action Strategies

MA Xiao-hua

(Research Center of Northwest Minorit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Elite Village has been a stud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government entry point for the villag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tinues to push forward the rural community in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are enormous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countryside of the more elite to learn more or become a political sociology, management disciplines, such as the focus of discussions and hot topics. In this paper, memory for the reference to the village to explore the countryside at the village elite memory of the modern changes in product strategy in action, the elite strategy to target analysis and reflect on the consequences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areas are to be reflected in society and embodied.

Key words: village memories; elite; strategy